

我的二哥张宗燧

张宗燧

(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100049)

张宗燧是我的二哥，他比我大差不多20岁。在我出生的那一年，他考取了英庚款去英国剑桥大学读博士了。我所知道的有关他小的时候的故事都是从父母的口中得到的。他在英国得到学位以后，留在欧洲继续他的研究工作，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，他才不得不回国。当时我和父母在沦陷区——北平，他回到了抗战的后方——重庆，在中央大学任教，我仍然没有机会见到他。抗战胜利以后，他没有回家，直接去了英国剑桥大学去做研究和教学，随后又应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去了美国，一直到1948年他才回国。那时的我已经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了，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难免有些陌生感，他也有些感到意外，十几年不在家，家里多了一个这么大的“小妹”。

听我的母亲说，二哥从小就有点“与众不同”，小时候很晚才会说话，走起路来也晃悠悠的，大家都叫他“傻二小”。可是大了一点，就表现出了他很聪明，他喜欢下棋，还喜欢自己发明新的“棋”，但是因为他的“棋”的规则是他自己定的，他总是可以赢，所以没有人愿意与他下这种“棋”，他只能以自己的左手与自己的右手对局。听父亲说，大哥和二哥上小学时，每到假期就要家里给他们

找“家教”来讲新课，讲完以后他们就可以跳一班。有一次，一个家教的老师找到父亲说，对不起，他教不了二哥，因为他太聪明了。于是就请辞了家教。

母亲说他喜欢挑战自己，总是不服输，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与自己“较劲”。我的大哥比他大一岁，上小学时比他高一班，他就不服气，一定要跳一班与我的大哥同班，而且还要比他学的更好。考大学的时候，当时由于父亲在燕京大学任教，可以给予子女优惠学费，所以他们两个人同时报考了燕京大学，大哥考取了生物系，他上了物理系。但是他不甘心在燕大读书，读了一年以后，想转学到清华大学，因为清华是国立大学，物理系有不少知名的教授。可是那时候燕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的竞争很激烈，燕大规定如果转学不成是不能返回燕大继续学习的，也就是没有退路。同时清华又要求很高，考插班生的题是很难的，家里人都是为他的转学决定捏了一把汗，可是他一点也不害怕，他对清华招生的人说：“你给我出题，你出题我就给你考一百”。果然他的微积分考了一百，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插班生。

上了大学以后，有许多社会活动，他觉得应该学会跳交谊舞，但是他在这方面显得有些“笨”，与

人家跳舞时，总是踩别人的脚。于是他下决心自己在家学，他在院子里摆了许多椅子，以代表舞场中有不少人在跳舞，然后抱着一个大枕头，把它当做舞伴，在椅子中间转来转去，用这样的办法来提高他的跳舞水平，引得大家大笑不已，他却一点也不介意，后来他的交谊舞的确跳得很好。

大学毕业以后，当时公费出国学物理的名额只有一个，老师劝他报考天文学的公费生，他是学物理的，没有学过有关天文的专业课，可他相信自己用几个月就能学好，果然他顺利地考取了天文学的留英庚款公费生。随后他去南京天文台实习了一段时间，发现自己并不喜欢天文学，于是又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：放弃去美国学天文的机会。第二年重新报考英庚款公费生，终于考取了去英国学数学的英庚款，这才满意。他就是这样对自己总是充满信心。

我与他的接触是从1948年他回国以后开始的，当时他在北大任教，我刚初中毕业，在城里读高中。我很崇敬他，他也很喜欢我这个“小妹”。我们经常一同去吃西餐，边吃边聊很开心。我上了高中以后，很喜欢数学和物理，所以也很想学物理。可是他开始时不同意，他对我说：“学什么东西要真的有

纪念张宗燧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专题

兴趣，而不是赶时髦。”他劝我学农，我听了很生气，觉得他瞧不起我，以为我在赶时髦，就与他大吵了一架。后来我经常找一些数学的难题去“考考”他，虽然考不倒他，但他从中发现我确实很喜欢数学和物理，就改变了态度，大力地支持我。过后我觉得他说的还是有道理的，学什么专业真的是要有兴趣才是最适合自己的。

1952年我考取了北京大学物理系，本以为可以与他在了一起了，可他却由于在“三反、五反”运动中受到批判，而从北京大学调到了北京师范大学。他心中很不平衡，我能够理解他。他在英国时是第一位在剑桥大学走上物理讲台讲课的中国人，多神气啊，可如今连北京大学都容不下他了，真的让他伤心。更让他生气的是，到了北师大以后，竟然把主讲的课安排给苏联专家，他嘴里不说，但是心里很不服气。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，他向领导表示所有的理论物理的课他都可以讲，包括高等数学。幸亏那位苏联专家知道他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，对他还比较尊重，这样他才感到舒服了一些。他在北师大的那段时间里，的确为各地来进修的老师开了多门理论物理的课，又一次成功地挑战了自己。那时我在读大二，很想早点开始学一些理论物理的课，走在同班同学的前面，所以一有空我就去北师大听他的课，哪想到他的课非常的深，对于我这个大二的学生很难听得懂，本想学学我二哥的“勇敢精神”，可最终没有得到什么收获，只在课后捞到了

一顿他请我吃的丰厚的午餐。

记得那时候要全面学习苏联，当然首先要学会俄文，我的二哥说他只要3个月就可以突击学会俄文，达到阅读俄文文献的水平。我心里有点不服气，要和他比试比试，看看谁记得俄文单字快、记得多。3个月很快就过去了，他的确达到了阅读俄文文献的水平，可我只记了不少单词，根本看不了文献，连俄文的普通物理的教科书都看不懂，只好老老实实地认输。

1955年波兰物理学家英菲尔德来中国访问，见到了中央领导，他提出这样使用张宗燧不合适，应该让他能发挥更大的作用。不久，在华罗庚所长的帮助下，二哥就调到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，在那里成立了一个理论物理研究室，由他任室主任，这样他就有更多的时间开展研究工作了，所以他很开心。1956年我大学毕业以后，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。当时我的大哥在北大生物系任教，住在中关村，我和二哥都在中关村，三兄妹都在一起，很是令人羡慕。尤其是在困难时期，物质生活虽然很苦，可是那段时间没有政治运动，是安心做研究的好时光。那时他的心情特别好，经常与我聊个没完。

记得当时二哥和我都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，我们每周可以得到一张5元的饭票，用它可以在“福利楼”吃一顿美餐，这在当时就是很大的“享受”了。二哥喜欢边吃边谈，他不会讲什么大道理，

但是有时候他说的话，细细回味一下还是很有深刻的含义的。他多次对我说，他觉得只有“悠哉悠哉”地做研究，才是最享受的，也才能做出好成果，所以他喜欢喝茶，讨论讨论，在放松中思考问题。我当时对他的这个说法没有什么体会，也没有明白什么是“悠哉悠哉”的意思，但是他说过多次，就留给了我深刻的印象。现在想起来觉得他说的非常对，做研究一定要静下心来，而不能带有急躁的情绪，在急功近利的心情下，只能出几篇文章，可是出不来好的成果。

美好的时光只有短短的几年，“文革”就开始了，我的家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。我的三哥和三嫂在文革初期就自杀了，父亲和大哥被捕入狱，二哥也进了“牛棚”，家里留下了妈妈，非常可怜。我也受到了批判，经常被“造反派”监视，成了“半个自由人”。有一次我听说有人在路上遇到了落魄地走着的二哥，我心里还暗暗地想，他大概是从“牛棚”里出来了，很想去看看他，可又怕“造反派”说我们是“黑串联”。哪想到他出来了没有几天，就在绝望中离开了我们。我真的好后悔没有去看他，他多么需要我的安慰啊。

值此二哥诞生100周年之际，我写下这点点滴滴，作为我对他的怀念。我由衷地感谢大家对他的学术成就的肯定和高度评价，因为这才是对他的最大的告慰。